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

郁贤皓 著

第一卷 李白丛考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资助出版

郁贤皓 著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

李白丛考 第一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ISBN 7-305-01118-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 / 郁贤皓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1101-701-4/I·29

I. 李... II. 郁... III. ①李白(701~762)—文学研究—文集
②文学史—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I207.22-53 I.209.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982 号

书 名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全三卷)
作 者 郁贤皓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8.75
彩 插 2
字 数 902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01-701-4/I·29
定 价 (精)118.00 元 (平)88.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1993年4月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拜见前辈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



1989年6月南京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后排左起：周勋初教授、郁贤皓教授、程千帆教授、孙望教授、章培恒教授、吴新雷教授。前排左起：张伯伟博士、张宏生博士、曹虹博士



1995年6月1日在日本著名李白研究专家松浦友久教授公馆作客，并由松浦教授陪同前往早稻田大学作学术讲演



1995年3月15日至5月31日在美国讲学期间，由美国唐学学会会长艾龙(Elling O.Eide)先生(左二)、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vtor H.Mair)教授(右一)及其夫人(左一)陪同游览奥兰多“锦绣中华”、“世界奇观”等景区



部分著作书影

《随园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宋永忠

副主任委员：沈 健 陈凌孚 笕佐领
吴康宁 许崇正 闻玉银(常务)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鸣	王小锡	王政红	田雨普	叶浩生
孙文瑜	刘旺洪	朱晓进	许崇正	李 艺
李 浩	张 杰	沈 健	辛 斌	陆天虹
汪永进	宋永忠	陈永高	陈国祥	陈凌孚
吴康宁	邵蔚蓝	周开亚	范景中	闻玉银
闫国年	钟振振	徐克谦	夏锦文	黄克谅
笕佐领	喻 平	鲁 洁	蒋伏心	傅康生
裴安平				

执行编委：王政红(兼)

总 序

公元 1998 年。21 世纪的钟声，已经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踩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我校领导立足于建设教学科研型的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高度，经多次研究决定，汇集本校历史上以及当今知名教授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随园文库》；选择颇见功力的青年教学研究人员的力作，编辑出版《青年学者文丛》；资助出版若干本校教师编写的优秀教材。这项举措，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为保证这三个系列图书的出版，由学校和校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其职能机构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办公室”。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由数十位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的《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以保证《随园文库》、《青年学者文丛》这两套丛书的学术质量。教材资助项目，则直接由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把关。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 1902 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成为许多名校之宗。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近百年间，多少学界巨子，讲坛精英，举师范薪火，耀群星而璀璨，传万姓以燎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江南北，教育事业空前

发达起来。处在江苏省师范教育龙头地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南京师范大学，越来越显示她巨大的作用和夺目的光彩。历史表明，要振兴教育，尤其是振兴高等教育，绝对要凭借一代又一代的名师硕儒，学术巨擘。否则，即使学校规模再大，也难免空头学府之讥。代表性学者的创造精神和他们的名家风范，对于文化的传播，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学风的垂范，实在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出版他们的著作，虽然是求其学识品行于万一，但对于后学诸子，仍然弥足珍贵。

文库取名“随园”，盖因南京师范大学之老校区，是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址上扩而大之，其地在南京城内清凉山东，小仓山下，据考证乃清代文学家袁枚“随园”之故地。“随园”早湮灭难考，袁枚在此所著《随园诗话》却久传不衰。青年大学生们常喜以“随园学子”自称。昔日“随园”，亭台楼阁，堪称海内名园之最；今日校舍，雕梁画栋，享有“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誉。可见，“随园”二字，内含多少文化信息！以“随园”来命名这套文库，既发思古之幽情，又达传世之美意，更挟后学之襟怀，岂不善哉！

《青年学者文丛》所收著作，多为本校四十岁以下之青年学者的扛鼎之作。他们正负重登山，不上则下。为他们出书，无疑是提供一点促进的助力。他们的著作，也许不如《随园文库》那样圆润周至，精辟老辣，但是他们敢立一家之言，敢树独家之帜，在知识创新的呼声日甚一日的今天，正顺应着时代的方向，代表着学术昌盛的未来。他们是学校学术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新一代的学界巨子，将从他们中间走出来。如果说，南京师范大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风光过，靠的是《随园文库》作者那一批精英；那么，要风光未来的一个世纪，靠的将是这一代青年和他们的承继者！

《随园文库》和《青年学者文丛》要通过多年才能臻于完成。现在采用的是逐年申报、逐步实施的办法。每年申报的选题,经《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认真评选、投票表决而确定。出版费用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全额资助或部分资助。从筛选书稿,到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直至印刷包装,均严格按照出版精品的要求来对待,务求使其成为精品。这些书稿凝结着我校几代学者的心血汗水、聪明才智。为了确保这两套图书得以精品的面貌问世,我们对书稿本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为此,作者或者其亲友传人,在出版图书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许多同志不辞辛劳,精益求精,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辑出版这两套大规模的系列图书,我们尚缺乏经验。选题时间跨度较长,又涉及多种学科,有些书稿又需后人整理,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我们一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尽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但是,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肯定还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祈请作者及读者海涵,并不吝赐教。

《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前 言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齐名的两位最伟大的诗人，但后人对他们的研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宋代，研究注解杜诗的著作极多，号称“千家注杜”，至清代，杜诗注本和研究著作多得不可胜计；而李白诗的注本经宋、元、明、清，仅有寥寥四五种，即[南宋]杨齐贤《李太白诗集注》，已佚。[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其中保留了杨齐贤的部分注释。[明]胡震亨《李诗通》，将李白诗分体编排，注解极少，但都很精辟。明代还有朱谏的《李诗选注》附《李诗辨疑》，他认为李白集内有二百多首诗不似李白风格，武断地定为伪作。清代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乃注释阐发最精当的李白集古注本。但由于李白诗多为抒情诗，很少有叙事成分，所以大部分作品无法编年，也因此很难确知作品的寓意。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胡怀琛等学者曾对李白的氏族、国籍、出生地等问题提出讨论，但最后不了了之。五十年代末出版的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实际上是四十年代撰成的，它将李白的大部分诗文编年，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现在看来仍有不少错误。同一时期出版的林庚的《诗人李白》，提出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代表，此说对后来的李白研究影响较大。但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李白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空疏的所谓“人民性”和“浪漫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方面，未尝对李白生平及其诗歌艺术作深入研究，故不可能做到知人论世。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很大震动。许多学人批评郭老对杜甫的评价贬抑过甚,而对李白的部分则很少提及。出于对李白及其作品的喜爱,我认真地将郭老书中李白的部分反复读了好几遍。我觉得郭老书中有一些精辟见解,如提出李白于开元十八年首次入长安,对《别内赴征三首》和《戏赠杜甫》诗意的理解也给我很大启发。但书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李白生平事迹中的许多疑点仍然未能解决;对两人长安的叙述也缺乏足够证据;对李白的交游多未稽考,甚至还误认“崔侍御”为崔宗之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时我认为,同建国以来所有的李白研究一样,都是由于对李白及其交游的各种史料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所以李白生平的许多事迹都是谜,大部分作品的寓意都停留在猜测层面而没有确证,无法编年,对李白一生的创作道路无从阐述清楚。从这时起,我就将李白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事迹及其交游进行深入考证研究入手,逐步解决李白生平事迹和作品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老大难问题,彻底扭转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空谈、不求实证的学风。

说到考据之学,建国以来学术界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有宏观的理论研究才有价值,微观的史料考证只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甚至有人认为考证方法是乾嘉学派的陈腐方法,今天已不需要。窃以为不然。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确有繁琐零碎的缺点,但那种崇尚实证、不尚空谈的认真细致的研究方法今天还是应该继承的。如果宏观的理论没有大量的微观实证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宏观的“理论”必然流于空论,甚至会出现错误的结论。前辈著名学者都重视考证方法。王国维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对一片片甲骨文作深入的微观研究,并结合《楚辞》、

《史记》等典籍对照考证，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元白诗笺证稿》，其中亦多为考证文字。岑仲勉先生一生从事微观考证工作，他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唐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突厥集史》、《唐人行第录》、《金石论丛》、《唐史馀藩》、《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等辉煌著作，都是用考证的方法写成的，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由此说明，考证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必需而又重要的方法。我虽不才，却很愿学习前贤的经验。

研究李白，当然首先要熟读李白的诗文作品，在这过程中，我对每篇诗文都做了一些札记。同时，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排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认真地阅读各种资料，从唐人别集、总集到各种笔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发现有有关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顺便说一下，当时我的读书并不是单纯寻找有关李白的材料，而是带着多项研究任务的。例如，我发现唐人诗篇中提到的交游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诗的写作年代，很难深入理解诗意，我就想到如果有部唐代地方长官的工具书该多好！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宰相表》、《仆堂丞郎表》、《方镇年表》、《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等，唯独没有今天研究工作者最需要的州郡地方长官的工具书，于是我决定承担起撰写《唐刺史考》的任务。所以，我在读书时，是将有关李白的材料和唐代刺史的材料以及拟在今后研究的项目所需的材料全部制成卡片的。边读边研究，发现新材料就写文章，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例如，当我读到《曲江集》中的《张说墓志》，其中提到“次子垺，驸马都尉、卫尉卿”，我立即想到李白有《玉真公

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于是我重读这两首诗，觉得诗中所写景况，尤其是用冯驩客孟尝君的典故，完全切合李白与张垞的身份，联系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记载：天宝初李白供奉翰林时，“以张垞谗逐”，说明张垞在李白一生政治生涯中是个关键人物。我又遍查现存典籍，开元中期到天宝初没有第二个姓张的卫尉卿。于是我断定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就是张垞。张九龄的《张说墓志》写于开元二十年（732），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730），说明张垞在此期间正在卫尉卿任，这正符合郭沫若推定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也就为李白开元年间确曾去过长安提供了切实证据。在这样多方面考证的基础上，终于写成《李白与张垞交游新证》一文。正由于遍稽典籍考证这个“卫尉张卿”，使我又想到唐代职官工具书还应该有一部《唐九卿考》，可使学人避免为找某寺某卿遍稽文献资料而不得之苦，于是我又承担起撰写《唐九卿考》的任务。

几千年来，研究李白的学者常喜欢从诗歌的风格和情调来确定写作的年代，其实这是靠不住的，我在研究过程中力求避免这种状况，尽量找到充足的根据给作品系年。例如《江夏别宋之悌》一诗，最后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二句，詹锳先生在《李白诗文系年》中据此系于肃宗乾元元年（758），“疑亦流夜郎途中作”。此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著和李白诗选本都从此说，认为诗的“最后两句情感很悲恻”，“当是流放夜郎途中经过江夏时所作”。有人还据此得出了李白晚年五律工稳的结论。可是我从《朝野僉载》、《唐会要》等典籍中考明宋之悌的事迹后，完全推翻了前人的说法。宋之悌乃初唐诗人宋之问季弟，也是肃宗至德年间营救李白出浔阳狱的御史中丞宋若思之父，开元十八年（730）就任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在此之前已历任右羽林

将军，益州长史、剑南节度兼采访使。又据杜甫《过宋员外之旧庄》诗，证知宋之悌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前已卒。由此可证，此诗乃李白开元二十九年前的作品，并据此可得出李白早期而不是晚期五律工稳的结论。前人之所以误以为晚年作品，主要原因是宋之悌其人失之不考。由此也使我深深体会到：考据对研究工作是多么重要！

李白在唐代就名闻天下，所以不但唐人笔记有不少李白的材料，作为正史的两《唐书》也都有《李白传》，对于这些史料都有鉴别真伪的问题。以往有些学者对正史的记载，往往深信不疑地加以引用，以之为据，常常以讹传讹。例如《旧唐书·李白传》记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这一记载，千馀年来人们相沿成说，从不怀疑，也不加深考。可是，当我读完吴筠的全部诗文，稽考权德舆的《吴尊师集序》，并查稽包括《道藏》在内的各种典籍，终于发现《旧唐书·李白传》的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吴筠开元年间一直隐于南阳倚帝山，从未到江南，隐于剡中乃大历年间事。吴筠待诏翰林乃天宝十三载事，天宝初未尝与李白一起待诏翰林。于是我撰写了《吴筠荐李白说辨疑》一文，推翻了沿袭千馀年的旧说。又据魏颢《李翰林集序》，提出李白天宝初供奉翰林乃出于玉真公主推荐的新说。这不但有充足的根据，而且，正因为是玄宗之妹玉真公主推荐，所以李白才受到玄宗隆重接待，这就合乎情理，可得到合理解释。所以，此说一出，立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接受。

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有时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从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寻找线索。例如郭沫若先生将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说成是崔宗

之,并说崔宗之名成辅;又据《旧唐书·李白传》说崔宗之由左司郎中贬为侍御史。我当时就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侍御史唐人一般尊称为“端公”,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才称“侍御”;二是唐人记载崔宗之的名都称宗之,未说名成辅;他一直历职郎署,未有为侍御史的记载,《旧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显然有误;三是李白有《泽畔吟序》,其中提到“崔公”曾“佐于宪车”,而未登郎署,当时我认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可能就是这位未登郎署的“崔公”,亦即《李太白集》中附于《酬崔侍御》诗前的《赠李十二》一诗的作者“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但苦于找不到更多证据,于是我从石刻拓片中去寻找线索。首先,我在《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志,证实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辅,排行不是第四,而是第五,李白诗《赠崔五郎中》即赠崔宗之,因此“崔四侍御”就不可能是崔宗之。其次,我从《北京图书馆藏墓志目录》中发现了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父、弟妹、两位同祖从兄的墓志,立即请友人抄录其中两张拓片,又专门写信请北京图书馆将崔成甫家族的墓志拓片全部摄制成缩微胶卷寄来。通过排比对照,终于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尤其是其祖父、父亲的两份墓志,大历年间迁葬重刻时都有一段附记,我推断这是成甫弟祐甫所为,附记记载崔成甫的事迹甚详,与李白《泽畔吟序》所叙崔公经历完全一致。根据上述材料,我终于写成《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一文,断定李白十首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为崔成甫,决非崔宗之,订正了郭老的错误。此文还考明了崔成甫的家世、生平以及与韦坚的关系和遭贬的原因,对理解《泽畔吟序》和酬赠崔侍御的诗篇都有很大帮助,并由此推知李白《古风》其五十一中的“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乃有所指,即以比干指李唐宗室李适之被杀,以屈平喻